

红毛长谈

萧乾



32274

红毛长谈

萧乾著



XWTS 0013613

台声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北京

红毛长谈

责任编辑:李纯一

装帧设计:李吉庆

勾霞

★

台声出版社出版(北京海淀区白石桥路54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海淀区科技开发研究所激光照排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960 毫米 1/32 印张 10 字数:180 千字

1990 年 1 月第 1 版 199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定价:3.2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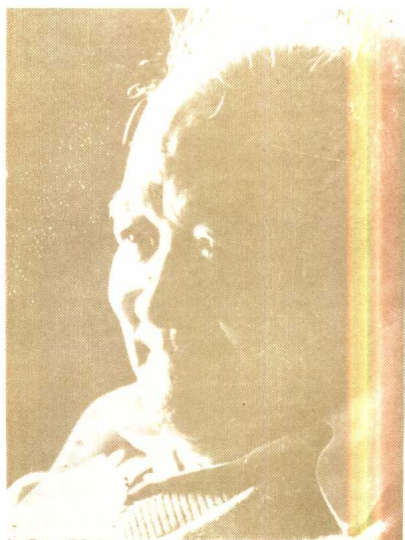
统一书号:ISBN7—80062—036—0/1·138

谨以此书的问世

敬贺萧乾老八十华诞

出版者

一九九〇年元月



萧 乾

萧乾的遗憾与幸福(编者序)

李 辉

—

我不能对“杂文”下个确切的定义,然而,一开始,我本想将这本书命名为《萧乾杂文选》。

如此取名,理由有二:

一,集子里的第一辑,在我看来,是绝妙的讽刺文章,它们不同于鲁迅的杂文,也与聂绀弩、夏衍的大有区别。作者的幽默似乎具有异国情调,手法、语言更是他所独有,与许许多多人们常说并称道的杂文比,它们又不大象严格意义上的“杂文”。但在幽默讽刺与政论的结合上,这些文章的精髓,却又与杂文毫无二致。据此考虑,故将《红毛长谈》一类的幽默讽刺文章,归名为“杂文”而统而称之。

于是,书名渐渐在我编选过程中产生了。我非常愿意将第一辑文章的特点加以突出,故以“杂文”概括全书其它类型文字。萧乾有过小说集、散文集、特写集、翻译文集,今天又有“杂文集”这一品种,使他

的创作范围又扩大了。一个“杂文家”萧乾将被人认识，岂不是我的一大功绩？

此言并非故弄玄虚，或有拔高、生硬之嫌，当你读完书中文章后，你会承认，这是别一风格的杂文。

二，“杂文”，顾名思义，杂揉杂拼之文章。除了书中第一辑是我所认为的特殊的杂文，另外几辑，有战地通讯、海外奇观、编辑答辞、人物杂记等，种类不一，实属杂样。将这样一些文章选编成一书，用“杂文选”为名，大概也是门当户对吧。

需要特别说明的，此书所选入的文章，除第一辑部分选自一九四八年出版的《红毛长谈》外，其余数十篇均散见于报刊上，主要是萧乾解放前创作的作品，从未收入集子。此次撰写《萧乾传》之后，将它们挑选排队、组成为一个新的集体。故文章各自的年龄也是很杂的，最长者出生距今已有五十多年，最小者也有三十岁了。

然而，起书名和起笔名一样，总有它的模糊性。有人对“杂文选”的命名颇不以为然，觉得文不对题，空而无当，有点虚，劝我不如来个实一点的，让人有点嚼头。于是，作者当年影响甚大的杂文集的书名《红毛长谈》，便在四十年后，重新出现了。不过，在我看，姑且将“红毛”代指作者，“长谈”呢，则是集子中的各类文章，应该算是极为贴切的了。

二

一个作家，如果属于优秀之列的话，他必然具有多种才能，这些才能常常是某种天赋，将它们适当地发挥，让才华充分体现，会是一个作家的最大幸福和满足。反之，留给自己、留给世人的，就不能不是遗憾。

编选此书时，不断涌现心头的，就是遗憾。

这遗憾，是极大兴奋和钦佩之后的遗憾，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无谓的历史的遗憾。

萧乾的才能是多样的，为与他同时代的作家所称道。巴金去年在给他的信中，仍然这样说。在朋友圈中，巴金认为有三个最有才气的人，一个是曹禺，一个是沈从文，另一个就是萧乾。

我读完了萧乾的全部作品，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散文特写等。他的每一体裁的作品，我觉得都可跻身于杰作之列。这一点评论界已早有公论，自不必由我多言。但当我读到由于政治原因而几乎湮没的《红毛长谈》及别的同类文章时，我惊奇于一个新的发掘，一个新的发现：这是一些多么精采别致的文章啊”

收入第一辑的《红毛长谈》及同一风格的文章，向我们展现了萧乾的又一侧面的才华，这就是他的幽默感和讽刺力。我甚至认为，这种幽默和讽刺，才

是他的创作才华的最独特的东西，他本应将它们尽量发挥，成为一名幽默讽刺大家。然而，他没有。

第一辑收入的文章，除《不会板枪的干什么好》和《我们太拙于国际宣传》、《“上”人回家》外，均写于萧乾自英国回到祖国之后的两三年间。这两三年正是中国内战爆发、人民解放战争步步走向胜利之时。长期与祖国隔绝的萧乾，乍从欧战中的英国回来，一下子陷入极度矛盾、痛苦的精神状态之中。他是一九三九年德国侵占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那天，离开香港前往欧洲的。在那里，他度过了一生中感情最痛苦、但记者生涯又最辉煌的七年。当战争的欧洲停息之后，他渴望回到思念已久的祖国，他希望自己的国家——一个已经遭受多年战争破坏的国家——也能象欧洲一样，从战争转向建设，让人民过上安定、富裕的生活，在政治制度下，他则希望英美那样的法治、民主，能够在专制的中国得以实现。

他是一九四六年国共重开战的时候回到上海的。和许多正直善良、但政治上并不成熟的高级知识分子一样，萧乾不能准确全面地理解这场内战的意义，更没有将内战双方本质的不同加以区别。他的最大愿望只是：停止内战，不要再打下去了。

正是在这种心理状态之下，他在《大公报》上开始发表专栏文章：红毛长谈。

在给我的信中，萧乾这样谈到当时的写作情况：

“刚到上海时，想试写个专栏，想用洋人半文半白、似通非通的中文写。一则可隐身份，二则本身带点滑稽。当时处于‘迷茫’时期，但出去七年，刚回到上海，一心只反内战，并无阶级观点。只求不打仗。第三，初到上海，看到许多不顺眼事物，乃以乌托邦形式来抒写自己理想的中国，其实，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国而已。”

《红毛长谈》及同类讽刺文章，就是特殊时代，特定环境中矛盾心理状态下的产物。历史已经过去几十年了，我们毋须也无必要再来指责萧乾及类似的知识分子当时的态度，也无必要再在那段历史上硬硬划出进步与反动的简单归类。需要的倒是深入探讨这一类知识分子的思想乃至理想上的合理成分，深入探讨这一类知识分子在历史进步上所起到的作用。当然，这样的文章此处是无法作出的，有兴趣的同行不妨一试。

“红毛长谈”套用“老生长谈”而来，“红毛”即当时对外国人（尤其是欧美人）的俗称。这个专栏的文章发表时，萧乾伪托“塔塔木林”的名字。木林，当时上海对外江佬多称“阿木林”，塔塔，则为萧乾随便起的，原是英国下层社会妇女再见时的用语。《红毛长谈》原书共收九篇文章，这些文章带有系列性，萧乾采用“塔塔夫妇”漫游中国的方式，时空交叉，呈现出他对中国现实的焦虑、愤慨，以及对未来理想世界的

憧憬。另外书后还附有沈从文化名巴鲁爵士撰写的《怀塔塔木林》，这是一篇摹仿“塔塔木林”笔法的绝妙文章。这次编选此书时，编者在篇目上略有删减，正文部分选入七篇，沈从文的文章未收入。

通篇运用反笔进行讽刺，这是萧乾的讽刺杂文的最为突出的特色。在三十年代，萧乾曾创作过《鹏程》这样的讽刺小说，那是采用正面揶揄、嘲弄的笔调，刻画主人公卑劣的阴暗心理，是一幅夸张的漫画式形象。《红毛长谈》中则采用大量反笔，以“伟大”写卑微，以庄重写滑稽，以光明写黑暗。正象英国作家亨利·菲尔丁，他的《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自始至终都采用反讽手法。解放后萧乾将菲尔丁的著作陆续翻译出版，可见他确实受到了这位英国十八世纪作家的影响。

萧乾撰写《红毛长谈》，主要是对当时的中国现实进行批判、揭露，但在数万字的系列文章中，几乎没有一处直接地加以抨击，他的讽刺才华决定他采用一种独特的幽默方式来表现。在《玫瑰好梦》一文开头，他写了这么一段：

“窃塔塔木林不见报方两周，竟累得各方读者探问安全，有的甚至要开追悼会。惟言登记手续并不易办，言语间似有请死者代为接洽疏通之意。余感激涕零之余，深惊异中国朋友下结论之迅速而一致。以为人一不见，非死于非命，即被绑架，未免对世事太悲

观矣。此种古怪心理，即在独裁统治下之爱沙尼亚亦未见也。莫非苦战八年后之中国人，犹生活于抖擞战慄中耶？夫‘抖擞’精神可，而‘战慄’心魂则不可。为巩固贵国治安（盖治安乃政府之根基），坚定人民之忠贞（人民忠贞为政府之靠山），余恳劝中国老幼国民，毅然决然放弃此种恐怖心理，庶中国不再有恐怖事件发生。夫祸患大半产生于脑中。（未审诸君同意否？）》

这里作者巧妙地将当局肆意捕人、杀人的现状，作了辛辣的讽刺和批判，文字却又显得轻松、活泼、潇洒，这正是萧乾的讽刺艺术的魅力所在。他一句话也不指责当局造成的恐怖环境，而是惊奇人们的恐怖心理，进而委婉地批评人们不该产生这种心理，读来却明白他的真正所指。

萧乾杂文的讽刺艺术不仅仅表现在反讽手法的运用上，有时他更象一位高明的导演，在舞台上导演出一场逼真的戏剧。当你为戏中人物、情节所吸引，所迷恋时，你会直觉地认为，他的戏就是舞台上所表演的模样。其实不然，狡猾的萧乾，他让你上当了，他要表现的真正的戏不在台上，而在后台。这个特点与反讽相似，不过更隐晦，更巧妙而已。如他佯作译文而写《中国舞台的歧途》，表面看是论述中国戏剧面临的危机，传统戏与西洋剧的冲突，将来戏剧舞台的发展。其实这舞台即是暗指中国社会的政治舞台，并

非就戏剧而言。据说,当年这篇文章还真骗了不少人,田汉也郑重其事地写出商榷文章,讨论起中国戏剧的优劣来。另一篇《中国音乐往哪里走?》也同样。萧乾将音乐来暗指中国政治。他指出中国音乐的特点:无乐谱、无指挥、演员可即兴发挥,西洋乐却重乐谱、靠指挥。言下之意,无非是批评当时中国无法律可循,各行其是。不属《红毛长谈》一书的另一篇杂文《侦探小说在华不走运》,借探讨侦探小说的特点,对中国当时随意抓人的黑暗现实进行了辛辣的讽刺。文中写到,英美等国为何侦探小说盛行,并有福尔摩斯这样的大侦探,因为在那里即使猜出案子是谁干的,但若无确凿证据,就不能抓人。而在中国则不然,“中国所以不会有侦探案,正是因为中国官府享有随意抓人的便利;抓进去,不必象‘七巧图’那么七拼八凑地去论证。只须一顿酷刑,要什么就有什么了。有这么直截了当的审案办法不用,而偏去雇个福尔摩斯出入四马路的漆黑弄堂;捉到人后,犯人硬嘴不承认,而又用飞机四处去拉证人,无怪读者认为全是矫揉造作,缺乏真实性了!”一个属于文学研究范畴的专题,与中国现实的揭露,就这样巧妙地结合起来,看似谈文学,实则谈政治,只有对这种现实有深切感受的人,才会觉察作者之用意。难怪一位专治中国侦探小说的美国年轻汉学家金介甫教授仍误以为撰写此文的萧乾曾研究过侦探小说!

这会儿该轮上我来说说遗憾了。

从《红毛长谈》等讽刺杂文看，萧乾的讽刺才华是出色的，是有他个人独有的特色的。遗憾的是他写得太少了。他自己说过，这类文章他一生只写过两次，一次是《红毛长谈》时期，一次是一九五七年，后一次他只写了一篇《‘上’人回家》（这次也将此文收入），不久即被划成右派，下放到农场劳动，再也不可能写作了。写得太少的原因很多，有他本身的，也有环境的，而几十年来那段特殊的历史，不能不说是最根本的原因。长期以来的文学单一化，长期以来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政策，长期以来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讽刺艺术（包括杂文、漫画、小说等等）未能得到应有的发展，萧乾个人才华的限制，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对他这毕竟是个遗憾，这遗憾又是后悔、抱怨而无济于事的。时间是无情的，对谁都一样。

这遗憾不仅仅属于他自己，也属于我们读者，属于杂文界。

说到杂文界，不免又想说几句。这几十年来如果说哪一种文学样式面容最为苍白，毫无疑问，是杂文。在只许歌颂，盛行假、大、空的年代，杂文这一最具战斗性的品种，失去了它应有的光泽，仅仅成为报刊补白的碎布，更别再说如何在质量上提高了。对于我们来说，讽刺艺术的限制，杂文形式的单调，无疑是

历史的一大教训。从杂文的兴衰上，我们不难寻觅出时代变化的轨迹。这几年，杂文开始走上发展的道路，但品种仍显单一，颇有千人一面之嫌。如何将杂文的路子拓宽，如何发挥杂文家各自的个性，是极为迫切的问题。

那么，我斗胆地说，读读萧乾的杂文吧，尽管为数不多，但它具有启发性。如不信请读读看。

三

对萧乾来说，一生中的遗憾大概很多，没成为讽刺大家，是我归纳的一大遗憾，不知他同意否？

不过，我觉得他的幸福远远多于遗憾——就事业而言。我的话在此书的另外两辑文章上可以得到证明。一辑是他作为欧战记者从英国发回的战地通讯特写，一辑是他作为《大公报·文艺》的编辑，在四年间写给读者的答辞。

他是幸福的。作为编辑，他一九三五年七月到《大公报》，一九三九年九月离开，差不多四年时间，他精心经营着“文艺”副刊，使这块副刊成为当时影响较大、对新文学贡献较大的报纸副刊，其作用不亚于五四时期的“学灯”副刊——我认为。因而，他称得上新文学发展史上的一名成绩显著的编辑。作为记者，他几乎在《大公报》工作了十五年。国内的灾区采

访、雁荡游记已经显露出他的记者加作家的才能，一九三九年到英国后，将近七年的欧战经历，更使他的记者生涯，达到辉煌的高峰，成为全国著名的驻外记者，他的这段欧战经历常为人羡慕。所以，他是幸福的。

在当《大公报·文艺》编辑时，萧乾有一大特点，就是经常通过给读者写信在报上发表的方式，密切编者与读者的联系。这些发表的答辞，一九三七年，部分曾收入与沈从文合集的《废邮存底》。这次我将重新发现的、未收入集子中的十余篇答辞列入第三辑。为了给读者一个完整的印象，我将曾收入《萧乾选集》第三卷的《一个副刊编者的自白》重新收入，这样，他刚接手办副刊时写的《园例》，到一九三九年告别读者时写的《自白》，一前一后，基本上可反映作为一个编辑的概貌。

这些答辞，文字是活泼的，艺术见解是独特的，从中反映出他的编辑立场，方针和文学观。这些，读者自会从书中了解到。我所要强调的，是透过这些答辞，我们可以看到青年萧乾的热忱，看到他如何将编副刊作为一种事业来干。进而，我们可以感叹，偌大的《大公报》，对一个刚出校门的青年人，是那样放心地让他去干，让他的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如果说幸福的话，这就是萧乾的幸福：他，只有二十五岁的青年（尽管入报社前他已经是作家了），能够按照自己

的文学观，按照自己的设想，在当时允许的范围内，经营一家副刊，使自己的热忱得以发泄，自己的才能得到发挥。英雄有用武之地，这就是幸福。说实话，他是很辛苦的。一个人编一个副刊，一周出四五个版，这在今天是不可思议的。我们看看周围，哪家报纸的副刊没有十个、二十个人？一个人的辛苦与精神上得到的兴奋相比，无论如何是次要的。正因为如此，萧乾能在一个人组稿、编稿、校对的情况下，坚持给读者写答辞，引导读者，辅导读者，把一个副刊办得有声有色。

萧乾的这种幸福，是与《大公报》的社长胡霖的用人政策分不开的。胡霖能够识才，用才，把一副重担放心让给萧乾去挑，很少限制他。可以说，没有胡霖的这种使用方法，萧乾的“编辑幸福”是难以得到的。同样，萧乾的“记者幸福”与胡霖也是大有关系的。

萧乾在回忆文章中写过，如果没有胡霖的支持，他很可能去不成英国。后来，他在剑桥大学当研究生时，又是到英访问的胡霖劝他放弃学业，到舰队街办起《大公报》办事处，作一名战地记者。看来，如果说萧乾是匹千里马的话，把胡霖称为伯乐是恰如其分的。

收入第二辑的战地通讯，散见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六年的报刊上。这些文章，萧乾当年都未收入